

论艾青与延安文艺(1941—1942)

李利霞

(榆林学院 化学与化工学院, 陕西 榆林 719000)

摘 要:延安文艺以特有的制度性和规定性要求作家必须沿着政治革命所需要的路线行走,但文艺的独特性又催促着作家对个人主义,尤其是对自由主义的追求。这一客观存在的矛盾必将导致作家无意间对延安文艺体制发生偏离。艾青在延安杂文运动期间所写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和《坪上散步》正是他本人对延安文艺体制发生偏离的显明表现。

关键词:艾青;延安文艺;偏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11)05-0054-03

收稿日期:2011-04-28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延安文艺对陕西当代文学的影响与启示”(2010JK358)

作者简介:李利霞(1983—),女,陕西榆林人,榆林学院化学与化工学院教师,文学硕士。

“延安文人是个较为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奔赴延安的个人背景和动机是复杂的,但大致可归纳为:叛逆者、逃亡者与追求者”^[1],他们有着相似的后蒙教育背景和对光明的渴望与敬仰的情怀,“他们都是新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因而对国民党的文化复古主义嗤之以鼻;他们都怀着强烈的理想主义和正义感,对国民党统治之下的种种黑暗、不平和堕落恨之入骨;而且他们也大都正值青年,平凡而孤寂的城市下层生活无法满足他们丰富复杂、绚丽多彩的青春渴望。在这种心情之下他们开始了延安之徙。他们是把延安当成一个梦想、一个天国来奔赴的,他们在延安的途中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而这些困难则更增加了他们对延安的渴望。他们都想象延安是一个能让自己摆脱压抑和束缚、充分实现个性的地方,而丝毫没有想到延安也会有它的规定性,丝毫也没有想到自己也还有一个怎样去适应延安的问题。所以在1940、1941年,延安这些已为数不少的文人就不加思索地按自己的自然习性组成了自己的社会。”^[2]然而,在中共的领导下,延安文艺必须为当时的政治革命服务,要求文艺必须摆脱自身的特殊独立性,尽最大可能发挥其应有的“实用化”,这必将导致文艺的

“集中化”,因为只有文艺的“集中化”才能发挥文艺最大的“实用化”。时代对文艺的这一特殊要求,对于这帮热血沸腾的文艺者来说无疑会造成极大的困惑和不适,再加上初来延安的那股热情淡然消失和对新环境的陌生,致使他们一时还抓不住写宏篇巨作的题材和语言,而鲁迅一手创作的以小见大、短小精悍的杂文文体倒不失为一种适宜而得力的表达形式。作为“文抗”中坚的艾青曾“艰难融合”在延安文艺中,但由于上述原因的存在也曾出现过对延安文艺的偏离。

—

鲁迅不仅因为是杂文文体的直接始祖而在延安受人尊崇,而且就鲁迅个人来说当时在延安也是备受推崇,其原因一是共产党与新文化运动的渊源(共产党的创始人也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力倡导者);二是毛泽东个人对鲁迅的欣赏;三是以萧军为代表的一批东北作家和鲁迅的直接师承关系。在延安出版的第一本文艺书籍《鲁迅论文选集》和1941年1月15日成立的由各方面人士参加的鲁迅研究会上也可以看出,鲁迅对延安文艺的影响之大。

延安杂文运动起初批判的锋芒是针对日本鬼子、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但从1941年起似乎在逐渐倾向于文人身边的琐事。丁玲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感受到了生活与环境的不协调,在《文艺月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大度、宽容与〈文艺月报〉》,指出社会上和文坛上对不良事物的宽容之风盛行,希望《文艺月报》“要以一个崭新的面目出现,把握斗争的原则性,展开深刻的、泼辣的自我批评,豪不宽容的指斥应该克服、而还没有克服,或者借辞延迟克服的现象”^[1]。但创刊的《文艺月报》并未对社会现实展开激烈地批判,倒是由她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我们需要杂文》一文为直接的导火索,引发了延安轰轰烈烈的杂文运动。文中作者批评了当时文坛上只谈死人不谈活人的逃避之风,批评了对伤害自己的不良现象忍气吞声的怯懦,也声讨了人们还不习惯于批评、对批评大惊小怪的恶习等,并坦率地指出“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须要督促,监视。”结尾还写到“鲁迅先生死了,我们大家常说纪念他要如何如何,可是我们却缺乏学习他的不怕麻烦的勇气。今天我以为最好学习他的坚定的永远的面向着真理,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我们这时代还须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举起它,杂文是不会死的。”^[2]从此真正意义上杂文运动在延安文艺界拉开帷幕。

从丁玲提倡杂文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发表的较有影响的杂文有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嚣张录》,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和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坪上散步》等。这些文章不同程度地鞭笞了现实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同时,报上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受读者欢迎的非作家写的一些杂文,如田家英、林默涵、羊耳等。开始他们的短文是针对着国民党统治区重庆的,于是传出了这样的话“你们的子弹打得太远,不知别人读到没有!石沉大海,不起作用……”^[3]可见,当时的读者也希望能读到与现实短兵相接的杂文,因而,中央青委的干部就在沟口办起一个大墙报叫作《轻骑兵》,专门发表对延安各种现象的批评性稿件,甚至在毛泽东的整顿三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之后,王实味还意犹未尽的在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壁报《矢与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我对罗迈

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和《零感两则》,这也成了延安杂文运动的终结,因为此事惊动了最高领导毛泽东,以至于深夜提着马灯去看《矢与的》,而且看后意味深长地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4]

延安兴起的杂文运动是知识分子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敢为天下先的率性行为,是文人秉性和独立精神的极度张扬。它对延安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行为在当时突破了中共可以忍受的限度或者说这次运动为中共纯洁文艺思想,重构延安文艺形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为整风运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突破口。拨开历史的云雾,我们发现,这些被视为异端的思想确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所不可或缺的良药,但它恰恰发生在一个非常态的环境中,一个急需歌颂但排斥批评的时代,历史的错位就这样发生了。这种历史错位的发生,对鲁迅杂文精神的追求必将引发对民主、自由和平等为价值尺度的追求。延安文艺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已最大可能地限制了知识分子的“自由”,所以作家以他特有的艺术步伐行走很难和延安的生活步调合拍。以揭露“黑暗”为主的“文抗”此时与延安的生活也是不怎么和谐了。中坚力量的艾青对个人主义,尤其是对自由主义的追求促使他生产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和《坪上散步》等不和谐的音符。这说明艾青审美的、理想主义的态度和政治家及现实主义对延安文艺的要求发生冲突,于是出现了他对延安文艺无意间的偏离。

二

杂文运动对艾青来说,是一种严峻的考验。热情洋溢来到延安的他,随着对新生活的逐渐熟悉,“看见了不愿看的东西:战争中有血,有死亡,有污秽;农村中的肮脏、愚昧、落后还不能完全消除,而革命队伍又以无产阶级的生活习惯、思想作风和铁的纪律严格地规范他们,于是他们感到了痛苦,失望,甚至出现幻灭和怨言。”他们“没有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提高到文艺要体现党在特定时期的政治方向,亦即党性原则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的高度。”^[5]

丁玲是杂文运动的先锋,王实味是杂文运动中打出最响一炮的人,艾青虽不怎么显眼,但《了解作家,

尊重作家》和《坪上散步》^①两篇文章刊出后,不得不引起人们对他的关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②是艾青“为《文艺》百期纪念而写”,文章开门见山指出,“作家是一个民族或一个阶级的感觉器官,思想神经,或是智慧的瞳孔。作家是从精神上——即情感,感觉,思想,心理的活动上——守卫他所属的民族或阶级的忠实的兵士。”艾青认为作家只是“一个民族或一个阶级的感觉器官,思想神经,或是智慧的瞳孔”,他们所“守卫”的远远超出一个政党的范围,他们“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的娱乐人的歌妓”,“作家的工作就是把自己的或他所选择的人物的感觉,情感,思想,凝结成形象的语言,通过这语言,去团结和组织他的民族或阶级的全体。”所以作家应该具有充分的自由——“除了自由写作之外,不要求其他的特权”,“他不能欺瞒他的感情去写一篇东西,他知道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去看事物,去描写事物,去批判事物。”因而,任何威逼利用作家去迎合他们的希望或需要而作的“作品就成了虚伪的,没有生命的”东西。“希望作家能把癣疥写成花朵,把脓包写成蓓蕾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人——因为他连看见自己丑陋的勇气都没有,更何况要他改呢?”

对当时最为敏感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艾青认为作家“用生命去拥护民主政治的理由之一,就因为民主政治能保障他们的艺术创作的独立的精神。因为只有给艺术创作以自由独立的精神,艺术才能对社会改革的事业起推进的作用。”在心灵深处艾青还是让艺术与政治平起平坐,甚至要高于政治,无形之中就漠视了革命纪律对一个用文艺从事革命的作家所应有的约束。失去约束的艾青仍用犀利的笔写道“等人瘙痒的还是洗一个澡吧。有盲肠炎的就用刀割吧。有沙眼的就用硫酸铜刮吧。生了要开刀的病而怕开刀是不行的。患伤寒症而又贪吃是不行的。鼻子被

梅毒菌吃空了而要人赞美是不行的。”文章收尾时仍无奈地写到:

尊重作家先要了解他的作品。作家在他作为作家的時候,不希求在他的作品以外的什么尊重。适如其分地去批评他。不恰当的赞美等于讽刺,对他稍有损抑的评价则更是一种侮辱。

让我们从最高的情操学习古代人爱作家的精神吧——

生不用封万户侯,
但愿一识韩荆州。

艾青的这一主张理论上虽然没有什么错,但它与现实对延安文艺的要求是错位的,是不合时宜的,背离了政治家及现实主义对延安文艺的要求和走向。但是,艾青与延安文艺的“偏离”并非有意为之,他是本着一个文人独特的个性而行事的,是循着艺术特有的独立性呼喊创作的自由的。其实,这也为艾青与延安文艺的新融合做了很好的铺垫。

参考文献:

- [1] 朱鸿召. 延安文人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 5.
- [2] 李书磊. 1942: 走向民间 [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2: 184 - 185.
- [3] 丁玲. 大度、宽容与《文艺月报》 [N]. 文艺月报, 1941 - 01 - 01.
- [4] 丁玲. 我们需要杂文 [N]. 解放日报, 1941 - 10 - 23.
- [5] 丁玲.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 [M] // 艾克恩. 延安文艺回忆录.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60.
- [6] 黎辛. 《野百合花》·延安整风·《再批判》——捎带说点《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读后感 [J]. 新文学史料, 1995 (4).
- [7] 骆寒超. 艾青论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157 - 161.
- [8] 艾青. 了解作家, 尊重作家 [N]. 解放日报, 1942 - 03 - 11.

责任编辑 王俊虎

①关于《坪上散步》和《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的创作时间的先后,在有关文章中存在着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先于《坪上散步》,后者是前者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上的进一步思考,如程光炜在《艾青传》中所言即是。而有的并没有明确说谁先谁后,只是根据其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将其放置于所需位置即可,如周红兴的《艾青的跋涉》。笔者以为《坪上散步》的写作时间应先于《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其因首先《坪上散步》的写作形式类似于《诗论》,共由二十三小节组成,可见此文并非一气呵成之作,应属随笔摘录;其次文章的落笔时间是“一九四二年立春,抄于蓝家坪”,而是年立春时间是2月4日,可得此文最迟应于2月4日完稿。《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是艾青应丁玲之约(后来艾青回忆也说是为了给《隔离》鸣不平而作)为《文艺》百期纪念连夜赶写的,可见当时之急。虽然文章最终没有落笔的具体时间,但根据上述之急,写作时间应靠近3月11日;再次根据二者发表时间《坪上散步》原载1942年2月12日《解放日报》,《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原载1942年3月11日《解放日报》的先后推论,《坪上散步》的写作也可能在前;最后根据二者笔锋的尖刻程度,前者锐利于后者,而按艾青在整个杂文运动中的急转程度推论亦可得:前者是其开篇之作笔锋应较为尖锐,而后者写作时整风运动已进一步趋于正规,对杂文运动的批判也露出不同程度的苗头,艾青此时适当的收敛也是应该的。再从此后《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和《现实不容许歪曲》的急剧转变,《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比《坪上散步》笔锋的含蓄也不乏为一种过度,由此《坪上散步》的写作时间也应属前。在本文的写作中,笔者按《坪上散步》的写作早于《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而作定论。